

# 作为政治话语的 1958年“新民歌运动”

赫牧寰

(齐齐哈尔大学 教育与传媒学院,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关键词] 新民歌运动; 政治话语; 民间意识形态; 政治节日化

[摘要]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38(2007)03-0091-03

On the Study of 1958' s New Folk Song Movement as Political Discourse

HE Mu-huan

(Education and Media College, Qiqihar University, Qiqihar 161006, China)

Key words: new folk song movement; political discourse; folk ideology; politicised festivals

Abstract: 1958' s New Folk Song Movement took place in the special situation of China' s political ideology. Its development didn't follow the rule and track of literature from the beginning. As literary discourse, it has lost its aesthetic nature of literature, but as political discourse, it realized the propaganda tragedies of ideology by borrowing the style of image expression of literary discourse. More than that, folk ideology contained by folk songs as literary discourse turned into the main curr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Besides, the wide participation of the people made "New Folk Song Movement" part of political festival in everyday life as political discourse,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life and spirit at that time.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made the ideology stronger by borrowing the strength of literary discourse, but the literary discourse fell into an embarrassed situation, as a result, literary discourse lost its unique eternal charm,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lost its active strength in social life everyday.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无疑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色彩。政治思想观念的强力渗透,政治理想的热烈追求,政治口号式的语言表达等都使得一场文学运动具有了浓厚的政治运动色彩。当时的人们在面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理性思考时,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首先以政治标准来看待写作者、评价者、研究者的立场和态度。全方位的强大的政治攻势已经改变了运动本身的性质,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口径去“创造”,已经代替了千百年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的审美创造原则。所以对“新民歌运动”作为一种政治话语的内涵,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 一、政治宣传话语的形象化

文学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语言是作为语言学上的一个名词出现的,它是指一切规范化的全民语言。而狭义的文学语言是作为艺术上的一个名词出现的,它

是指在文学作品中使用的、具有审美属性的语言。很显然,政治宣传话语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文学话语。但是,在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政治宣传话语与文学话语的特质发生了混淆,这就导致了文学话语的抽象化与“自动化”,它的巨大的表现功能被指称功能所遮蔽,而政治话语又借助于文学话语的部分功能实现了自身的对话策略。

很多资料都记载了“新民歌运动”发生的最为直接的诱因。1957年的冬天,广大农村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展开了兴修水利的热潮。许多地方为了动员群众,将政治、生产口号歌谣化,出现了“沟不通,不放松;水不到田,不回家过年”,“不怕冷,不怕饿,罗锅山得向我认错”这样的歌谣式口号。1958年2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一些代表在发言中引用这些歌谣化的口号,来说明工农业生产的“跃进”形势。诗人萧三挑选了其中的一部分,集

[收稿日期] 2006-12-04

[作者简介] 赫牧寰(1966-)男,齐齐哈尔大学教育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研究。

中在报刊上登出,并称它们为“最好的诗”<sup>[1]</sup>。这些政治、生产口号歌谣化的所谓的诗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于是有了1958年3月22日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及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可见,现实的意识形态的需要是这场运动发生的最为直接的诱因,领袖的倡导使之走向扩大和深入。这种民间歌谣式的生产口号,一方面对调动劳动热情、推动农业生产,激发人们站天斗地改造自然的精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使一直主张“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诗人毛泽东从中看到了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宝贵力量,寄希望于下层民间力量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但是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最终都归之于政治意识形态建设的策略。

“青年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深翻土地要大干,万斤亩产能实现”。“干劲高,干劲高,吓得江水倒流海回潮;干劲高,干劲高,要把黄、圃二山一担挑”。两首新民歌都是写“大跃进”时期,人们的冲天干劲的,所不同的是前者给人的感觉就是押韵的政治口号,后者更具鼓动性的是加上了形象化的“江水”、“海潮”、“大山”这样的别出新意的形象,但是就其本质而言两者都是为“大跃进”进行摇旗呐喊的政治宣传工具,话语本身更多的是指称功能的展现,些许的表现功能只能强化政治宣传鼓动,而不能从本质上使之脱离政治话语的规范而进入审美话语的范畴。

所以,1958年“新民歌运动”无论是从文学发展的资源意义上看,还是从民间文学自身的发展看都不具有建设性意义。把执政党的方针政策以文学化的方式迅速传达深入到群众中去,成为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确实起到了异乎寻常的宣传效果。但是,作为文学话语来看,它必然导致审美活动本质的丧失,文学话语魅力的消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并且将其作为“方向和道路”只能使文学创作走向死路,而且它也必将导致文学批评话语的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独特性、文学话语的蕴藉性、文学批评话语的审美理性都将受到巨大的破坏。形象化的政治话语对文学话语的僭越只能使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成为一句空话。

民歌创作是自由的,它既是创作主体的精神自由,也是心灵表达的情感自由,在自由的情感与形式创造中,人们率真任性地在现实与想象的世界自由驰骋。然而,“新民歌运动”自其发生时就被当成一种政治任务以配合蓄势待发的跃进形势,当“大跃进”的号角吹响的时候,它又成了跃进旋律中的一篇激进乐章。自上而下的各级党委的号召,取代了自下而上的民间心声。“从大多数‘新民歌’的创作过程及体现的创作思想上看,他们并不是群众在日常生活、劳动中的自发创造,在实质上,是围绕当时实施的政策和流行的政治口号的命题做诗”。<sup>[2] 166</sup>各种政治文本、新闻文本,统统都成了全国人民写作新民歌的先制性话语范本。反之,以“歌颂”为话语核心的“新民歌运动”又对这种先制性话语范本起到了巩固加强的作用。原本是“搜集”,反倒变成了“创作”,人们像完成经济指标一样,忙于完成新民歌写作指标,民歌不仅失去了全面的自由性,更失去了在口头传承中“集体”生成与积淀的时间和空间,即时应景的、虚假的粗制滥造代替了“口由心声”的自由抒情。

文学话语与政治意识形态本是不可分离的,但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力渗透,政治话语全面取代文学话语,文学

话语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审美蕴藉,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自己的永恒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力量。

## 二、民间意识形态的主流化

在我国,意识形态这一词语曾因“极左”政治而变得令人生厌,但是这一名词概念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又是不可分离的。在当代哲学研究中,对意识形态内涵的揭示可谓多种多样,但是无论怎样界定它的内涵,意识形态都有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形态的区分。我们认为,主流意识形态是掌握社会政治话语权力的个人或集团的各种思想观念体系;而民间意识形态则是散见、渗透于民间日常生活之中的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同、相通或相异、相悖的思想观念。主流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体系性,具有极强的话语威力;而民间意识形态则不以体系性为标志,因社会制度不同,可能具有话语威力,也可能不具有话语威力。无疑,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也同样具有这样的表现形式,而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的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具有统领一切的力量。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在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现代化基础薄弱的大国执政的道路。面对旧中国的现实,国际国内对中国共产党有没有领导、组织和管理经济活动的的能力,普遍存有怀疑的态度。但是,经过三年的努力,国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面对这种喜人的成绩,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希望,增强了自信,全党上下一致认为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经济建设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当代政治的需要。面对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速度,毛泽东提出了“赶英超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宏伟设想。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引领下,“赶英超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

从“新民歌运动”涌现出的作品看,新民歌话语已经全部被主流意识形态政治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成功地占领了民间意识形态话语阵地,民间意识形态的丰富性荡然无存,这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来说不能不是一种遗憾。在大量的夸饰性的新民歌语言中,产量、速度、干劲、力量全部充分地得到了体现,民间日常生活形态、思想观念、感情欲望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存在也是被批判的对象)。

新民歌作品中也有的一部分涉及到男女婚恋、母女亲情的作品,但是即使人类这种最普通的生活行为,最普遍的情感因子,在中国古代民歌中得到最充分表现的题材,它的民间日常生活意义也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消解。“尽管你把口弦吹得再响,姑娘的心啊,一点不变样,生产大跃进中你得了第一,我的荷包自然能送上”。“久不见娘心想娘,回家见娘也平常。睡到半夜心又急,明日社里要挑塘。”这些民歌所传达的不是情感信息,而是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当这种自然的人性,以唯一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它的情感虚夸不言自明。当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统领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全党、全国、全民族的集体意志时,民间个人的话语空间、情感空间只能是一种隐性的、被遮蔽的存在。

民歌作品本应具有鲜明的民俗性,这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粗略统计,《红旗歌谣》也编选了十几个民族,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新民歌作品,但是这些作品除了因社会分工的不同而带来的生产劳动内容的不同外,传统民歌所蕴含的大量的民俗风情已经完全为新的时代话语所消解,除了阶级的政治理念外,跃进的劳动成为唯一被确认的描写对象,劳动无疑是民歌话语的主要内容。这样的作品虽然歌颂与赞美了“大跃进”火热的劳动场面、劳动激情,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一种盲目的、冲动的,违背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科学规律的“异化的劳动”、“异化的激情”的歌颂,而且在“新民歌运动”中,这种异化劳动成了新民歌展现普通人日常社会生活的唯一内容。歌颂为“大跃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劳动的政治话语的全方位确立,最终消解了民歌所蕴含的婚丧嫁娶、男女私情、节日庆典等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最终导致了民间文化的绿洲沙漠化。

### 三、社会生活的政治节日化

对1958年“新民歌运动”,郭沫若在当时曾作过这样的评价:“目前的中国真正是诗歌的汪洋大海,诗歌的新宇宙。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像火山爆发,气势磅礴,空前未有。”<sup>[1]</sup>人们在所谓诗的海洋中尽情狂欢。

巴赫金在总结狂欢节型庆典活动的礼仪、形式时指出,在狂欢节中所有的人都是参加者,“人们不是静观狂欢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且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因为按其观念它是全民的。在狂欢节进行期间,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除了狂欢节的生活以外,没有其他生活。人们无从离开狂欢节,因为他没有空间界限。”<sup>[4]</sup>在狂欢节中“人们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同非狂欢节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节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sup>[5]</sup><sup>176</sup>全民性、仪式性、等级消失、插科打诨是其根本性的特征。巴赫金在阐述自己的“狂欢化”理论时还注意到了表面具有狂欢化特点的“官方节日”。“官方节日”的目的是使现有的制度神圣化、合法化和固定化,它肯定现有的社会制度、政治秩序和等级关系,因此它的音调和气氛是严肃和死板的,是没有生气的,一切诙谐的因素与它的本性是格格不入的。它缺少民间狂欢的本质内蕴——快乐的精神、人性自由张扬的精神。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表面上看具有巴赫金所谓的“狂欢化”的特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程式规范下的普遍参与;文学创作不再是知识分子作家的专利,全民不分职业,不分文化水平,不分男女老幼平等参与其间,自由创作和发表;“新民歌”作品虽不具插科打诨的文学话语,但是相对于知识分子的创作,在所谓的诗人

们的神圣精神追求中,高雅的审美形式创造中,呈现出一个时代的喜剧色彩。然而当我们认真思考这种全民狂欢的壮观景象时,我们会发现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并非是自下而上的民间自觉,而是由主流意识形态发起的自上而下的全民的非自觉参与;是极其严肃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而非插科打诨式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是在平等参与的文化运动中,对参与者的审美创作及审美欣赏权利的反动。因此,政治话语的“新民歌运动”实际上是社会生活政治节日化的必然表现之一。节日是非常态的、短暂的、快乐的,然而当节日注入了强烈的、沉重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并且这种政治节日年年、月月、日日地存活于社会生活中时,社会生活也就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节日化,而永远的、无法逃离的政治节日对世俗的人们来说是一种无边的苦难。节日狂欢需要“加冕”和“脱冕”,然而当政治节日只有“加冕”,而没有“脱冕”时,它必然地使生活走向唯一、僵化和有序下的无序,这也就使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走向了自身努力方向的反面。

在“大跃进”——政治节日狂欢的年代,在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新民歌运动”中,人们真的相信了“过去诗人有几何?如今人人写诗歌”,“漫山遍野歌声高,都是唱的丰收调”,“干劲越大歌越多,越唱心里越快活”,“中国人多诗人多,一人一首比星多”,“诗画来自车间里,工人就是诗画家”,“战士人人是歌手,战士人人是画家”的神话,但是,当人们从虚妄的天空回到现实的大地时,当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在政治节日化的生活中创作的所谓诗歌时,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借助于超自然的唯意志力量让人产生的无法比拟的激情、无法言说的快乐、无法形容的欢欣鼓舞瞬间化为巨大的、永恒的虚空和失落,进而化为对现实的怀疑和否定。所以,尽管当时人们努力从各个层面论述政治节日化的“新民歌运动”的合理性,但是它无论如何也不能抹去社会生活的政治节日化色彩带来的非审美的弊端。

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式的文学运动中,政治意识形态左右了文学艺术创造,它改变了新的时代精神文化建设的方向,造成了“五四”以来新诗创作实践的主体性的缺席。不仅如此,作家、诗人、理论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话语策略,这使得文学陷入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迷宫,充满生命个性的文学审美话语的创造走向了僵化,蕴含着丰富民间文化的民歌这一艺术形式本身,也被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内容所左右。当政治意识形态以强势话语权力支配审美意识形态话语时,文学文本也就一变而为政治文本的附庸,审美意识形态丧失了自身的主体地位。

### [参考文献]

- [1] 萧三.最好的诗[N].人民日报,1958-02-11(8).  
 [2]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3] 郭沫若.大跃进之歌·序[J].诗刊,1958(7).

- [4] 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M].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90.12.  
 [5]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88.